

中山大学图书馆学术丛书第七种

谭祥金 赵燕群 文集

谭祥金 赵燕群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中山大学图书馆学术丛书第七种

谭祥金 赵燕群 文集

谭祥金 赵燕群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谭祥金 赵燕群文集/谭祥金, 赵燕群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306 - 03783 - 1

I. 谭… II. ①谭… ②赵… III. 图书馆学—文集 IV. G25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2098 号

出 版 人: 祁 军

策划编辑: 邹正芬

责任编辑: 王俊辉

封面设计: 潘 群

责任校对: 程 杰

责任技编: 黄少伟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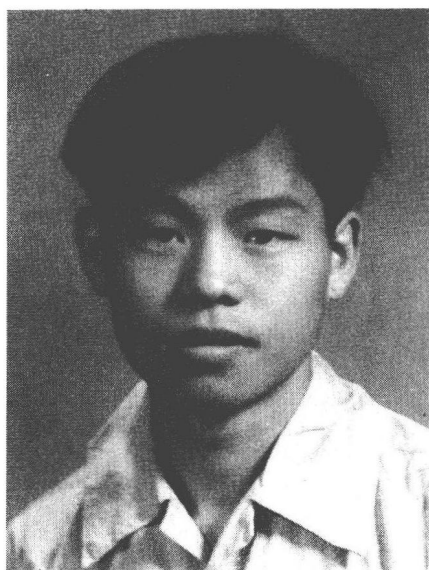
规 格: 787mm × 960mm 1/16 91 印张 150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 套 (上、下卷)

定 价: 390.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谭祥金大学一年级（1960 年）



赵燕群大学一年级（1960 年）



三年困难时期（1961 年）



中山大学寓所屋顶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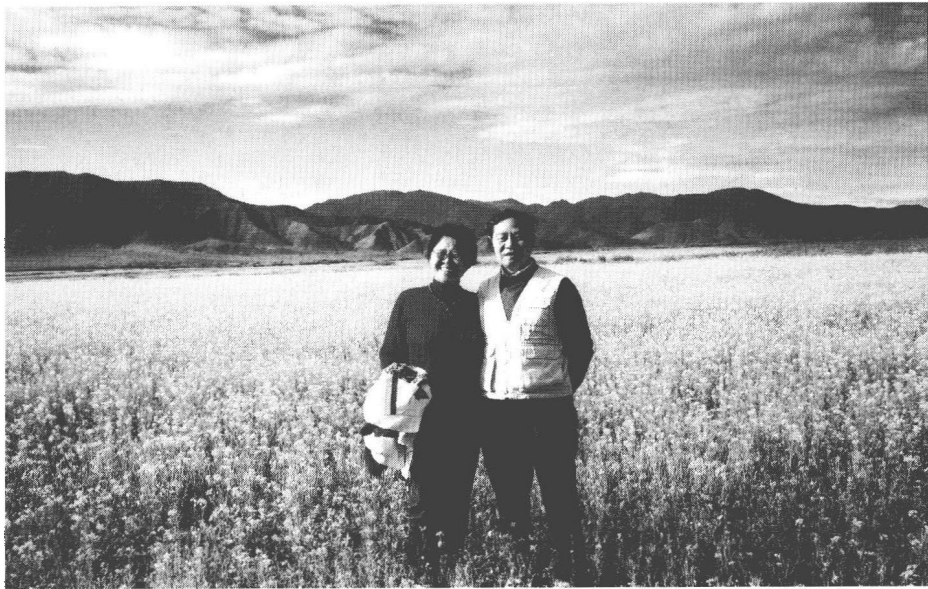
60 寿宴和孩子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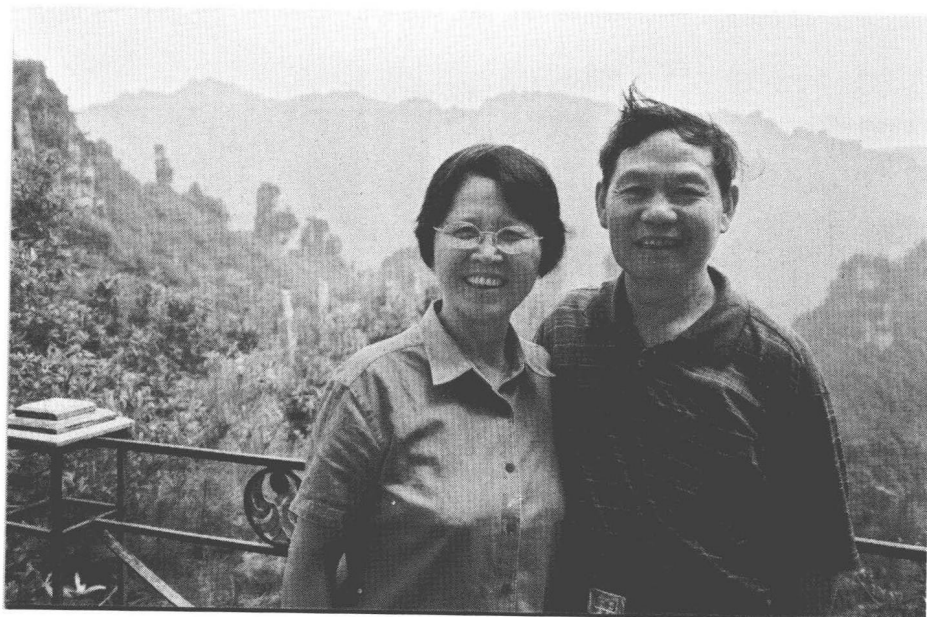
孩子们长大了 (2010 年)



西藏之旅（2002 年）



西藏之旅（2002 年）



湘西之旅（2007 年）



岭南瑶家山水（2008 年）



七十寿宴和图书馆的青年才俊在一起



全家福 (2010. 11. 19)

序

编辑出版谭祥金老师和赵燕群老师的文集，一直是我们的共同心愿。早在2009年4月庆祝谭祥金老师70华诞时，我们就曾计划先行编辑出版谭老师的文集，后因为2010年11月是赵燕群老师70华诞，前后相距仅一年有余，于是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谭老师和赵老师论文合集，一并祝贺谭老师和赵老师70华诞，共同赞美谭老师和赵老师的事业成就和美好人生。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求学时，谭老师就是我十分仰慕的学长。谭老师1963年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后服务于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1973年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时年34岁，在全国闻名遐迩，更是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的骄傲和荣耀。记得1980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60周年庆典时，在位于校行政大楼西侧附楼的系办公室内悬挂着多幅祝贺字画，其中一幅为谭老师撰写由书法家书写的书法作品。那时，我不过是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对图书馆界的名人几乎一无所知。副系主任彭斐章老师在向我们介绍谭老师赠送的这副书法作品时，喜形于色，赞口不绝，令我们对谭老师油然而生敬。这就是我第一次知道谭老师的情形，一种挥之不去的羡慕和仰望的心情。

1985年秋，因为赴北京查找硕士学位论文资料的原因，导师谢灼华老师托我顺便将初拟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教材编写大纲带给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担任副系主任的赵燕群老师，并告知赵老师是谭老师的夫人。这令我喜出望外。在去赵老师家的途中，我一直在猜想赵老师是什么模样，谭老师是否也会在家，他们会如何对待我这个不速之客。那时鲜有公用电话，更没有手机，造访如同瞎撞，撞上了就撞上了，撞不上下次再撞。我选择周末的一个上午前去赵老师家，没想到一撞就撞上了，而且谭老师也在家。我自我介绍后，赵老师招呼我坐下，热情地沏茶，房屋不大，仅有20多平米的二居室，陈设也非常普通，毫无想象中的奢华，谭老师过来询问武大老师的情况，一点架子也没有，令我感到十分亲切，心中的惶恐顿时烟消云散。那次短暂的拜访在我心中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迄今难忘。

1986年秋，谢灼华老师在武汉大学举办《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教材编审会，那时我初到中山大学任教，亦作为编委应邀参加会议，再次见到作

为副主编的赵老师而倍感亲切，从此与赵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那时，我们天南地北，天各一方，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今生今世会有机会与赵老师和谭老师一起共事。也许是机缘巧合，也许是命中注定，我竟然有幸与谭老师和赵老师共事，并因此改变了我的人生。

1988年10月，谭老师在离开北京图书馆副馆长职位出任文化部对外展览公司副总经理后，因无法舍弃毕生为之奋斗的图书馆事业，决意放弃在京的官职，与赵老师一起返回赵老师的故乡，南下广州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学系执教。这是一件非常需要胆识和勇气的事情，因为那时的中国正处在市场经济炽热发展的第一波浪潮中，很多人都非常羡慕副总经理这样的职位，求之不得，谈何舍弃。再说，像谭老师这样的副厅级干部，虽然在北京不算什么大官，可是空降到中山大学则不是小事，因为那时的中山大学校长也不过是厅级干部。当时就听说，谭老师到广东工作得到了乔石夫人郁文和谷牧夫人牟锋的支持与帮助。而且谭老师亦表示从此以后不再为官，一心挥鞭执教，搞专业，因此，谭老师和赵老师南下中山大学的事情办得非常迅速顺利。在北京时，谭老师在北京图书馆供职，赵老师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来到广州后，谭老师和赵老师互换了工作，谭老师在图书馆学系任教，赵老师则在校图书馆供职。虽然这是中山大学原则上不允许夫妻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的客观规定，但是，大家都明白，为了谭老师，赵老师作出了不小的牺牲。这正是赵老师非常值得敬佩之处。

谭老师和赵老师来到中山大学后，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元宵节时图书馆学系组织全体教职员工和家属去广州越秀山看四川自贡灯会，那时系里的老师对初来乍到的谭老师和赵老师似熟非熟，若即若离，不冷不热。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于是，主动陪伴在谭老师和赵老师左右，话长话短，以尽“地主”之谊。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众所周知的重大政治风波，其后高校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党内学习活动。我清楚地记得，在全系党员民主生活会上，不少人都想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我，企图置我于死地，我毫无畏惧地奋起反击。在我孤军作战身陷重围时，一直一言不发的谭老师突然站出来，怒斥这种栽赃陷害年轻人的丑恶行径和“文革”遗风。于是，民主生活会的风向为之一变，转而有不少老师开始对我进行褒奖，使我基本顺利地渡过了原本就应该顺利通过的政治关口，避免了蒙受不白之冤。患难见真情，从这件事情上，我深刻地感到谭老师是一位充满正义感和嫉恶如仇的好老师，是一位值得终生信赖的朋友。

1989年9月，因为实在无法拒绝学校多方动员和反复劝说的诚意，谭老师不得不出任图书馆学系主任。那时，中山大学图书馆学系正处在百废待兴，矛盾重重的时期，谭老师励精图治，将图书馆学系改名为信息管理系后，致力于本科教学改革和学科建设。

1991年7月，谭老师开始实施信息管理系组织架构改革，力排众议，大胆启用年轻人担任各教研室主任，任命我做图书馆学教研室主任，陈明先做情报学教研室主任，陈永生做档案学教研室主任。那时我们三人都不过是二十七八岁的讲师，在整个中山大学的教研室主任层面也不多见，因此暗地的非议和公开的质疑一直不绝于耳。谭老师面对这种非议和质疑时，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做：我34岁都做到了北京图书馆副馆长，这几个年轻人做个小小的教研室主任有什么不行？！后来的事实证明谭老师大胆启用年轻人的做法颇具远见卓识。在谭老师的大力栽培下，我们个个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上奋勇当先，一路凯歌。1992年，陈永生和我破格晋升副教授，1994年和1995年又分别破格晋升教授，忝列当年中山大学仅有的三个35岁以下的年轻教授行列，迅速成为档案学和图书馆学的骨干教师。陈明先转职证券界后亦成为领军人物。因此，这也造就了我日后在主持学校各相关学院和单位的工作中不拘一格大胆启用更为年轻人才的一贯作风。

1994年7月，为期四年的系主任任期届满后，谭老师坚辞系主任，力推我接任，因为我资历太浅，学校不同意。不得已，谭老师只好再度出任系主任。校组织部到系里宣布任命通知时，谭老师再三声明，由出任副系主任的我主持系里的工作，他只在幕后辅助，学校亦点头认可。1996年7月，谭老师主动上书学校组织部，力陈我两年来在主持系务工作中的表现，认为我完全能够胜任系主任职责。于是，学校同意了谭老师请求辞去系主任的报告，改由我接任系主任，时年35岁，在中山大学独一无二。1998年6月，赵老师在中山大学图书馆的两届馆长任期届满，因接近退休年龄按照规定不能续任馆长，学校乃任命我担任校图书馆馆长。因此，我先后接任了谭老师的图书馆学系主任职务和赵老师的图书馆馆长职务。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从1985年第一次在北京拜访结识谭老师和赵老师，到1996年和1998年先后接任两位老师的管理职位，前后不过12年。在这12年中，因为谭老师和赵老师的大力栽培，我走过了令许多人羡慕不已的成长道路。没有谭老师和赵老师的知遇之恩和奖掖之功，我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今生有幸与谭老师和赵老师共事，并享受两位老师的恩荫，这是我莫大的荣幸，永世难忘。相信在谭老师和赵老师身边的年轻同仁亦有与我相同的情愫。

谭老师和赵老师南下广州，不仅是我们年轻一代的福祉，也是图书馆事业的福音。

1990年6月，在谭老师的大力支持下，我在中山大学组织召开了第五届全国图书馆学情报学青年学术研讨会。利用这样的机会，谭老师将我们一批年轻人推向了图书馆学界。

1995年，谭老师和赵老师利用他们在国际图书馆界的影响力，通过与美国 OCLC 王行仁先生的合作，在中山大学召开了全球首次“中文文献数据库国际会议”，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荷兰、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大陆和港澳台的代表首次聚集一堂，探讨中文文献数据库建设的一系列问题，从此奠定了中山大学在全球华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上的创始基石。1997年，谭老师、赵老师和我一起赴武汉大学参加“第三届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研讨会”，成功申请到下一届研讨会的举办权。1998年6月，在谭老师和赵老师的指导下，我与香港岭南大学图书馆馆长冼丽环合作，成功地举办了“第四届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术研讨会”广州中山大学会议和香港岭南大学会议。也就是在香港会议期间，我们酝酿成立了“华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联络小组”，小组成员包括：大陆的谭祥金、孙蓓欣、徐引赅，台湾的张鼎锺、顾敏，香港的冼丽环、谭惠康，澳门的邓美莲、王国强。召集人由小组成员轮值，首任召集人为冼丽环馆长，中山大学为常设秘书处，由我负责具体事务。1998年11月，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馆长借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成立50周年纪念之机，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21世纪中文图书馆研讨会”，与会者多为欧美和香港人士，会议期间，郑炯文馆长与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周和平等会晤，商定将“华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联络小组”发展成为“全球华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1999年6月，“第一届华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在北京西山举行，欧美、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大陆和港澳台的各方代表与会，并确定了8个合作项目，其中赵老师代表中山大学图书馆负责孙中山数字图书馆项目的建设，由此开启了全球华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新局面，迄今合作会议已经举办8届，促成了12个合作项目。谭老师和赵老师在其中的创始之功和卓越奉献不可磨灭。

1990年9月，以台湾“中央”图书馆馆长王振鹄为首的台湾图书馆界代表团一行十四人在海峡两岸隔绝四十年后首次访问大陆，开启了海峡两岸图书馆界交流的序幕。访问结束后，沈宝环教授只身来穗探望在广州的妹妹沈宝媛，并到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与广东图书馆界人士举行了座谈会，谭老师和我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并陪同沈宝环教授参观了中山大学。其后，谭老师

一直致力于促进海峡两岸图书馆界的学术交流。当时谭老师一直担任着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曾与尚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长已南下广州担任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的黄俊贵一起斡旋，试图聘请沈宝环教授担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名誉理事，但禁忌未开，虽多方努力，终未能如愿。于是，谭老师和广东图书馆学会常务副理事长黄俊贵合议，决定先聘请沈宝环教授担任广东图书馆学会名誉理事，这在海峡两岸开禁以后是一件具有胆识的了不起举动。

1995年11月，沈宝环教授应谭老师的邀请前来广州，参加广东图书馆学会名誉理事聘任仪式，同时到中山大学访问讲学。从此，中山大学成为海峡两岸图书馆界交流合作的先锋。在沈宝环教授即将结束在中山大学的访问时，他表示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助中山大学信息管理系，并执意留下随身携带的3千元港币。当时3千元港币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我请示谭老师如何使用这笔捐款才能更有意义，于是，我们决定以此为契机展开学生的科学研究活动，发起了信息管理系“五四青年学术研讨会”，发动学生研究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撰写学术论文，参加学术研讨。

1996年，在谭老师的亲切关怀下，系学生会主办了第一届“五四青年学术研讨会”，其后连续举办了四届，直到我卸任系主任以后才无疾而终。尽管如此，我们一直舍不得使用这3千元港币，直到2005年我再度出任资讯管理系主任时，我仍然以此为“引子”，设立了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第一个奖学金——沈祖荣沈宝环纪念奖学金。如果没有谭老师的指引，我可能也不会有此作为。1997年，受美国岭南基金会的资助，谭老师赴台湾访问讲学三个月，足迹遍及宝岛，与台湾图书馆界的同仁建立了非常广泛的联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记得大约在2002年左右，广东公共图书馆界的同仁提议广东图书馆学会组织代表团赴台湾考察公共图书馆事业，我作为学会理事长出面联系，并委托已经退休的赵老师带队，全权负责十余人的广东公共图书馆访台事宜。因为赵老师与台湾图书馆界有着十分广泛的交往且行事周密细致，那次访问台湾公共图书馆之旅十分成功，受到海峡两岸图书馆界的一致肯定。后来，资讯管理系与台湾多个图书馆学系所签订了交流合作协议，常年频繁交流。这些全赖谭老师和赵老师奠定的友谊基础。

1997年7月，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五届理事会，谭老师继续担任副理事长。1998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换届，谭老师又是力排众议，将我推到学术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的岗位上，迄今我已在副主任委员的岗位上服务达12年之久，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1999年4月，在谭老师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长、广东图书馆学会常务副理事长黄俊贵的大力推荐下，我出任广东图书馆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长，迄今已连任三届，任期达 12 年之久，其中亦做过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这些不仅得益于谭老师的提携，而且得益于谭老师的教诲。谭老师是中国图书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1979 年，正是在谭老师的筹划组织下，中国图书馆学会才在新中国成立 30 周年之际得以成立，因此，谭老师担任了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秘书长。其后，谭老师历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和第五届理事会副理事长，任期长达 20 余年，贡献卓著，在中国图书馆学会的历史中可谓绝无仅有。谭老师常言：图书馆学会的工作不外乎“对事业有利，对会员有益”。这十字箴言令我终身受用不尽，我一直将这十字箴言作为我从事图书馆学会工作的座右铭和指南针。凡是符合这十字箴言的事，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做，结果自然一直都受到会员们的认可。

面对同仁们赞扬我的作为时，我经常会说，大树底下好乘凉。谭老师和赵老师就是这样的大树，这两棵大树一直恩荫着一大批包括我在内的年轻人。

谭老师自 1988 年来中山大学任教后，一直主讲图书馆学概论、图书馆管理、传播学等本科专业基础课程，担任图书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培养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本科生 1 千余人，培养图书馆管理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数十人。赵老师作为资讯管理系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亦培养信息检索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十余人。谭老师和赵老师犹如学生的严父慈母，对学生既非常严格，又非常关爱，深受学生爱戴，学生们毕业以后一直保持着与谭老师和赵老师十分亲密的联系，令许多人羡慕不已。

谭老师从北京来到广州后，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完成了从图书馆管理者向图书馆学教育者的角色转换，潜心执教和著述，先后完成了《文献信息学导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 年）、《图书馆管理综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年）、《信息管理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等著述。谭老师自 1989 年出任中山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以后，一直主张淡化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三个专业的界限，打通三个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为此，谭老师在 1989 年亲自挂帅开展了信息管理系的第一次教学改革和教学计划调整。《文献信息学导论》正是在这种教学改革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实践而产生的成果。谭老师从事图书馆管理工作 20 余年，具有高屋建瓴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从教以后，跳出图书馆管理世界，再看图书馆管理，自然更加深刻和客观，讲授图书馆管理课程，各种案例信手拈来，如数家珍，妙趣横生，深受学生的欢迎。《图书馆管理综论》和《信息

管理导论》正是在谭老师长期的管理实践和悉心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成果。谭老师的著作，文字朴实，处处与实践紧密关联，绝无云山雾罩的空洞言辞，直到今天在图书馆学教育界亦不多见，可谓独树一帜。自然，这种朴实的学风也造就了中山大学信息管理系毕业的一代学人。自1988年来广州后，谭老师一直不遗余力地从事信息管理系的学科建设，我时常陪伴谭老师左右到各地寻求同行的支持，然而由于种种客观原因，直到谭老师年满60周岁不得不按规定退休时我们也未能取得图书馆学专业博士学位授权，至今仍令我引以为憾。

与此同时，赵老师则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开辟了另外一片新天地。自1989年起，赵老师参与了全国第一次文献普查工作，在对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馆藏进行系统调查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加强对古籍善本的保护，在经费极其拮据和馆舍条件不佳的情况下，向学校申请到专项经费，从江西订购一批樟木书柜，有力地改善了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收藏的条件。与此同时，赵老师与馆内年轻技术骨干一起研发开通了图书馆自动化流通系统，为图书馆实现自动化管理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后，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赵老师决定转换深圳图书馆自动化系统。1992年，在学校经费拮据的情况下，赵老师四处奔走，最后广东省高教厅教学处同意拨出28万元专款供中山大学图书馆购买小型机。1993年，中山大学图书馆开始实现图书馆自动化管理，实现了从传统手工操作向现代化管理的转变。与此同时，赵老师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率领图书馆的同仁相继开展港澳研究数据库、珠江三角洲数据库、教育数据库、中山大学博硕士论文库、经济学专题库等数据库的建设，使中山大学图书馆在极短的时间内跃居全国高校图书馆数字化、自动化建设的前列。作为广东省高校图工委副主任委员，赵老师并不满足于中山大学图书馆的一馆自动化，还积极推进广东高校图书馆的全面自动化管理。在赵老师等广东高校图工委委员的推动下，广东省高教厅统一拨款为各省属学校购买深圳大学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使广东省高校图书馆在90年代中期全部实现了图书馆自动化管理。

赵老师是一位学者型的图书馆专家，在分类法和检索语言研究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作为编委和顾问，赵老师参加了《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多次修订工作和《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社会科学检索词表》的编制工作，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修订工作，主编了《教育科学主题词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教育分类表》。为了配合专题数据库的建设，赵老师还专门编制了《港澳与珠江三角洲研究主题表》、《潮汕研究主题词表》、《孙中山研究分类表、主题表》、《家具研究分类表、主题表》等

分类主题词表。在主讲文献检索与利用、分类法主题法等课程的同时，积极编写教材，1990年编写出版《文献分类与主题标引》，1997年主编《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并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的相关学术论文。赵老师还是我国著名的期刊管理专家。早在北京工作期间，赵老师就是铁道部科技情报研究所主办的《科研成果》期刊主编，对连续出版物的编辑出版、收集、管理、利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来到广州以后，赵老师通过游说广东省高教厅，于1994年创办了由广东省高校图工委主办的《高校文献信息学刊》，赵老师作为主编负责组稿、审稿等多项工作。新刊物的创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记得在为创刊号组稿时，赵老师曾约我写一篇关于周连宽教授的文章，我欣然应承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赵老师布置的“作业”。后来，赵老师把具体的编务工作交给我来做，使我从中学到了不少编辑出版的技术与方法。直到今天，赵老师的《期刊工作浅说》、《报刊管理》、《连续出版物工作》等著作仍然是从事期刊管理工作的必读著作。

在赵老师带领下，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面貌焕然一新。赵老师在完成从图书馆学教育者向图书馆管理者的角色转换后，迅速成为广东乃至全国图书馆界的著名图书馆管理专家，并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我曾称赵老师和深圳南山图书馆馆长程亚男、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馆长黄昕为“广东图书馆界女中三杰”，她们三人都是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20世纪60年代的毕业生，在各自管理的图书馆中和图书馆学研究中均建树颇丰，成为当年广东图书馆界一道十分亮丽的风景线。2002年，她们三人同时获得广东图书馆学会在全国首次设立的“杰出贡献奖”，成为图书馆界垂范的榜样。

谭老师自1975年开始参与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新馆的规划筹建，1983年9月，北京图书馆新馆一期工程奠基启动后，一直全面负责北京图书馆新馆的建设，直到1987年7月新馆竣工，对现代图书馆的建筑模式、规划设计、功能布局、工程管理、家具设备、自动化系统、搬迁开放等均具有十分丰富的理论与经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开始出现改革开放后的第二次图书馆新馆建设高潮，各地竞相聘请谭老师参与图书馆新馆的规划论证，谭老师均乐于奉献自己的智慧和经验，使诸多图书馆受益匪浅。我们可以从收入这部文集的谭老师的相关著述文字中窥见一斑。2001年，谭老师退休后应深圳图书馆馆长吴晞的聘请，担任深圳图书馆新馆建设顾问，全力辅佐吴晞馆长建设深圳图书馆新馆。谭老师做事一向兢兢业业，未曾有丝毫怠慢，虽是担任深圳图书馆顾问，仍然坚持每周一上午去深圳，周五下午返回广州，一干就是五年多，直到2006年7月深圳图书馆